

研究論文

# 褪色的技術迷思： 影子教育的數字資本與女性在線勞工

陳靜

## 摘要

論文通過影子教育中女性網課教師的深度訪談與線上田野調查，討論了以下兩個研究議題：第一，分析線上教師的群體構成、技術使用和勞動方式。第二，探討當代中國線上教育的「技術迷思」，並理解數字資本、技術平台與線上勞動三者的複雜關係。研究發現：互聯網平台利用「互聯網+影子教育=社會公平」這一長久的「網絡迷思」，以抹平教育資源不平衡，幫助實現階層流動的社會責任為標榜，利用了商業與文化的既有迷思，構建出一種駁雜的「技術迷思」，並以此吸納勞動力，迎合數字資本，獲取政策保護。技術平台通過跨區域勞動力調集，隱匿勞動者身份與地理位置，將低廉的在線勞動包裝為高附加值的一對一服務，賺取勞動差額利潤；在勞動過程中實現了「去實體化」和「勞動分包」，通過「數字圓形監控」實行勞動控制，線上勞動者的「課時轉化」「空間度讓」「情感勞動」和「模糊工作邊界」都成為新的勞動付出。勞動過程中，女性在線教師原本對平台抱有的「技術迷思」

陳靜，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數字媒體系副教授。研究興趣：媒介社會學。電郵：chenyili@zufe.edu.cn

論文投稿日期：2019年4月17日。論文接受日期：2020年8月18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開始迅速褪色，這並非是技術普及與使用的「祛魅」，而是線上勞作的體驗、個體對平台本質和勞動價值重新評判的必然結果。

關鍵詞：影子教育、技術迷思、在線勞工、數字資本

---

Research Article

## **Faded Technical Myth—Digital Capital and Female Online Labour in Shadow Education**

Jing CHEN

---

### **Abstract**

The following two research topics were discuss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onlin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female online teachers in shadow education. First, the work analyzed the group composition, technique use, and labour manners of online teachers. Then, we explored the technical myth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online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among digital capital, technology platforms, and online labour.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Internet platforms used the long-standing Internet myth of “Internet + shadow education = social justice” to smooth out the imbalance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rough taking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realizing class mobility as a slogan, the existing myths of business and culture were used to construct a mixed technical myth. Thus the labour force was absorbed to cater to digital capital and the company obtained policy protection. The technology platform concealed the identities and geographic locations of workers through cross-regional labour mobilization. Cheap online labour was packed into high-value-added one-to-one services to earn profits from labour differences. In the labour process, “dematerialization” and “labour subcontracting” were realized, and labour control was implemented through “digital circular monitoring”. Online workers’ “class-hour conversion,” “spatial degree,” “emotional labour,” and “fuzzy work boundaries” had all become new labour contributions. During the

---

Jing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igital Media, School of Human Arts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sociology.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labour process, female online teachers' original technical myths about the platform faded quickly. This was due to the online labour experience and individual re-judgment of the nature and labour value of the platform, instead of the popularization and use of technology.

**Keywords:** shadow education, technical myth, online labour, digital capital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Chen, J. (2021). Faded technical myth—Digital capital and female online labour in shadow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6, 127–159.

## 致謝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媒介形態變遷背景下的受眾研究」(16BXW06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感謝訪談過程中所有受訪者的配合，論文大綱曾經在「2018年長三角青年傳播學者論壇」和「2018年浙江省傳播學會年會」進行報告，感謝與會專家的細致點評，感謝吳飛教授和黃旦教授的寶貴建議，李志對本文亦有貢獻。最後，感謝匿名審查人及編委會建議，幫助筆者聚焦問題，釐清原稿的歧義、模糊之處。當然，文中任何疏漏，概由筆者自行負責。

## 研究背景與問題

這是一則2018年4月24日在騰訊視頻發布的3分23秒的企業形象廣告，畫面整體籠罩著乳白色的高光調，展現了兒童一對一在線學習的場景，穩重的男性畫外音開始描述國內中小學的補習教育現狀：

2017年，全中國小學、初中、高中在校人數達到1.5億人，二線城市的孩子無法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一線城市的孩子則在補習的路上頭痛不已……（在我們的平台）學生們都在通過電腦、PAD、手機、電視與來自清華、北大等一流名校的好老師交流學習，……教師、教研團隊通過對學生課上的圖像語音進行分析，能快速掌握學生的積極性和學習習慣，從而打造與之匹配的學習方法。……（企業宣傳片中部分解說詞）

我們的教育是精英陪伴式教育，讓教育公平，讓學習高效快樂，我們竭盡一切可能地到全國各地尋找最優秀的教學資源，把它放到互聯網上，傳遞到最需要它的地方，傳遞給最需要他的家庭，改變我們的下一代，改變中國的未來。（企業董事長最後激情陳述）

如果不了解這是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的企業廣告，大多數人都會被其展示出的網路教育拉平地理差異的「技術迷思」（technical myth）所吸引，它印證了互聯網初期人們對線上教育抱有的美好想像，光芒四射的線上教育似乎從技術上修正了資源不平衡，顯示出解決複雜社會問題的「超能力」。該影子教育公司總部位於上海浦東某地鐵站附近一棟富有設計感的白色大樓內，簡潔明快的風格頗有互聯網企業風範。獲得五輪投資後，2018年7月公司開始正式啟用裝修好的大樓，課程顧問樂於將大樓照片或視頻展示給家長們，深藍色夜景映襯背透燈光，大樓外觀契合了人們對互聯網公司的想像。線上教育代表著未來技術方向的「迷思」（myth）不再隱秘根植於人們頭腦，或是被遺忘在互聯網的某個歷史角落，而是附著於精緻的大樓、公共交通和網路視頻的商業廣告上，擁有了生動的現實軀殼。

國內影子教育一對一線上模式的快速發展成為我們討論的社會背景。這一線上新職業的興起得益於K12（Kindergarten to 12th grade）影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子教育的迅速市場化。影子教育指為主流教育 (mainstream education) 提供的系列學科課外補習輔導 (supplementary private tutoring)，因如影子相伴而得名。K12階段雖然政府推行免費教育，卻已經成為國內城市家庭高度參與，家庭資本和學生精力投入最多的年級段。據中投顧問2018年發布的《2020–2024年中國K12教育行業深度調研及投資前景預測報告》數據顯示，中國教育產業仍處於擴張階段，其中K12教育市場規模2018年約達到4,331億元，線上教育市場規模約為437.9億元。影子教育在國內的快速增長可以從社會變遷、階層固化、中產焦慮等幾方面獲得解釋：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發展孕育了一批城市中產階層，出於階層向上流動的渴望，中產父母們對子女教育抱有相當期待；加之根植於東亞國家悠久的科舉文化傳統影響，以及教育資源日漸集中，精英大學競爭日趨激烈的態勢，迫使城市家庭普遍選擇學科輔導機構，幫助深化學校內容，實現子女培優。學齡青少年在父母陪伴下奔走於各培訓機構成為都市的日常景觀。2017年之後，以免除父母子女奔波之苦為宣傳要點的某線上輔導模式在國內一線城市鋪開，在競爭激烈的影子教育市場中快速佔據了一席之地。

在該公司的企業宣傳片中，影子教育一頭連接著待輔導的孩子，一頭連接著提供服務的女性網課教師。廣告中優雅大方的女教師手持平板電腦與孩子進行線上交流，那麼，日常真實的勞作中，當網路技術與人工勞動結合，是否一切真如廣告那般輕鬆便捷？我們研究的公司輔導業務覆蓋小學、初中、高中各階段，在同類培訓機構中有較高知名度。線上一對一上課模式產生了大量的線上勞動者 (online labour)，進行線上田野考察時，其公司上海總部2018年12月17日液晶屏數據顯示：今日累積上課學生人數達到336,113名 (課程顧問和班主任偏好在周日發布上課人數的監控數據，通常為一周高峰數值)，這意味著當日連線另一端有33萬名網課教師作為知識商品化 (knowledge commercialisation) 的內容供給方提供服務，其中絕大部分是女性全職教師。透過她們描繪的線上勞動形式和勞動體驗討論其中「情境化的知識」 (situated knowledge) 成為研究動機，為此，我們討論的第一層面將重點關注技術與女性在線輔導工作的結合情況。

從「技術迷思」這一概念出發，探討影子教育公司在企業形象包裝中如何與「互聯網迷思」(internet myth)緊密關聯成為研究的另一重任務。迷思的探討源於人類學、神話研究和符號學，卻早已遠離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筆下的原始社會和現代消費社會的話語背景，而更貼近傳播政治經濟學家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借助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和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所表達的意涵。莫斯科將互聯網迷思從文化研究範疇移植到政治經濟學領域，並逐個擊破了歷史終結、地理終結和政治終結三種迷思，批判了賽博空間普遍存在的樂觀想像，技術迷思「讓我們付出代價，它慫恿我們用有關未來的迷思來避免當下的衝突，並創造出一種社會團結的虛假意識」(莫斯科，2010：14)。隨著國內影子線上教育在數字資本(digital capital)推動下的狂飆突進，技術迷思如何被製造出來，又扮演了何種角色？對勞作的在線勞工、報課家長和數字資本而言，技術迷思的內涵是否有差異？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對技術迷思的成分和編制意圖分析，這或將加深對新媒介形態催生的商業模式背景下，我們對數字資本、技術平台和在線勞工(online labour)<sup>1</sup>三者關係的理解。

## 文獻回顧

### 影子教育研究的焦點：從「雙刃劍」到「在線化」

近十餘年盛行於東亞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等地的影子教育已成為社會學和教育學的重要研究對象(中澤涉，2015；史蒂芬·R·英里奇，2017；馬克·貝磊，2000，2007，2012，2015；Choi & Park, 2016)。研究證實補習與家庭經濟狀況和成績提升效果有密切關聯，接受影子教育輔導與家庭經濟水準、父母陪伴相關，參與培訓的學生通常有更優秀的課業表現(李佳麗、何瑞珠，2019)。近年學者們探討影子教育是否阻礙了社會流動和社會公平，為此主流教育中同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時兼職培訓的教師群體成為批判對象，因為公眾認為其掌握的教育資訊會加劇原本的社會不公平(social inequality)(丁小浩、翁秋怡，2015)。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家庭文化背景對教育獲得的影響將隨著入學階段上升而降低，社會應注意早期影子教育的公平性(唐俊超，2015)。有研究發現影子教育的實際支出、形式和質量在一線城市和一般縣級城鎮之間呈現顯著差異(孫聰、金文旺、蔣承，2018)。社會階層越高，影子教育需求越大，從而產生對低階層群體的優質教育擠出(徐家慶、周遠翔，2018)。總的來說，影子教育與精英家庭合作可能加劇了教育不平等，成為社會複製與社會分層的又一通道，是學者們的普遍共識(林曉珊，2018；胡詠梅、範文鳳、丁維莉，2017；劉保中，2018)。影子教育實證研究多圍繞是否提供社會升學機會這一問題展開。一項對影子教育機構「坑班」的調查指出，選拔成為維護或加劇社會不公的具體通道(尚培勝，2017)。將北京城市父母的家庭、學校及培訓機構的「協作培養」與農民工家庭的「散養」對比，另一項研究發現不同階層在子女培養方式上存在巨大差異(高雪蓮，2017)。歸納起來，影子教育的功能被認為是維持和強化了優質教育資源的獲取，家庭社會、文化資本與影子教育共同完成了不平等的社會階層再生產。

當整個社會都捲入應試教育的激烈競爭中，影子教育成為普通家庭的「雙刃劍」，雖可能幫助提升子女學業，但投資私人教育加重了家庭經濟負擔，影響了其他消費開支(薛海平，2017)。在影子教育的選擇上，家庭短期導向越強，越傾向選擇影子教育，因為其高效和補充特性迎合了此類家庭所需(陳濤、鞏閱瑄、李丁，2019)。英里奇關注參與教育決策過程中的學生意願，強調學生作為行為主體的重要性，探討了影響最終決策的結構性環境因素(史蒂芬·R·英里奇，2017)。儘管認識到影子教育過度發展會加劇學生學業競爭壓力，消耗家庭和社會的大量資源，削弱政府推進教育公平的成效(Bray，2003)，聯合國教育專家馬克·貝磊(Mark Bray)通過對不同國家、地區制定政策的理念差異分析後指出，這是經濟促動與倫理問題間的選擇。從政府立場出發，影子教育有顯著的社會經濟功能，補習產生的巨大產業有利於解決勞動力就業(馬克·貝磊，2007)。以上研究豐富了影子教育本質與社會功能的了解，但也存在缺失，尤其僅視影子教師為學生學業



成績的外在影響因素，繼而關注其相關的倫理問題、教學效果和經濟作用，而非視其為有獨特價值的勞動研究對象。與此同時，隨著資訊通信技術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s) 的技術滲透，傳統學校封閉的高牆發生鬆動，網路打破時間和空間阻隔，將教育諮詢送達偏遠地區，影子教育的快速線上化賦予了傳統勞動問題新的討論背景。在數字資本積極參與影子教育的在線化熱潮之際，大量研究還停滯於平台商業預測或數字技術討論，影子教育線上勞動的新特質和數字資本的影響尚未得到及時的關注。

### 在線工作與女性數字勞工

傳播政治經濟學近年圍繞著「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ur) 與「數字勞動」(digital labour)，以及相關聯的傳播資源的生產與消費的新型權力關係及其建構進行了剖析。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Christian Fuchs) 延續了達拉斯·斯麥茲 (Dallas Smythe) 的「受眾商品論」(audience commodity) 中將媒介形態與勞動形式結合的思考路徑，將批判的鋒芒指向了互聯網大公司對用戶的雙重剝削 (Fuchs, 2009, 2014)。將數字勞動視為馬克思的工業勞動敘事的延伸而非顛覆成為普遍共識。邱林川區分了從事製造的勞工 (manufacturing labour) 和被製造的勞工 (manufactured labour) 兩類群體後，指出當前互聯網的本質「是資本的場域、剝削勞工的場域，也是社會的場域、抵抗的場域、階級形成的場域」(邱林川, 2014: 122)。因興趣而導致的玩工 (play labour) 如字幕組憑藉興趣參與生產，提供內容產品而並不擁有真實的勞動收入 (曹晉、張楠華, 2015)。批判日漸崛起的互聯網文化及其背後深植的資本經濟體系，指明產銷者 (prosumer) 被剝削的本質，揭露媒體平台對用戶內容與基礎設施的雙重資本壓榨，成為文化研究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交匯議題。

近年隨著在線勞工的出現，他們的勞動與職業研究開始受到關注，影子教育的女性在線勞工即屬此類，她們進行的並非無償的趣味勞動，而是線上補習服務，通過幫助學生們應對選拔性考試，從平台獲取個人報酬，她們既非文化研究討論的內容創造和參與者，也非傳播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政治經濟學中「作為商品的受眾」，而是因知識或技能獲得工作機會的線上勞動者。與之相關的新型在線職業者的勞動形態、價值和關係已有一定成果(姚建華，2017a，2017b；姚建華、徐婧，2017；姚建華、徐恩驩，2019)。具體的數字勞動研究案例正在不斷豐富，有作為知識勞工(knowledge worker)的網路編輯群體(曹晉、許秀雲，2014)、IT程式員(孫萍，2018)、互聯網公司的無酬高校實習生(夏冰青，2018)、城市外賣員(張玉璞，2019)、遊戲主播(徐林楓、張恒宇，2019)等，這些在地研究充實了勞動與社會理論在新時期的發展。

學者們另一個關心的問題是網路社會的新職業是否給女性帶來了新工作機會。早期互聯網工作具有一定的溢價性，也促進了性別工資的增長，但研究認為對於不同婚姻狀況、年齡和學歷的就業者而言，影響作用存在差異(Krueger，1993)。技術與勞動力之間簡單替代的推測並沒有獲得廣泛支持。例如，技術進步一度被認為可能造成收入不平等和大量職業消失，而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詳盡分析資訊技術對社會組織與就業的影響，指出「資訊技術的擴散與整體經濟就業水準的演變之間並沒有系統性的結構關係」。他不支持技術提升影響就業的猜測，但同意缺乏資訊技術則更容易被排除在新工作機會之外。(Castells，2010：280)有研究分析了電腦普及對不同類型勞動力需求的影響，發現電腦的普及後價格下降增加了對具有高等教育經歷的勞動力的需求(Autor & Dorn，2009)。隨著國內線上新職業不斷出現，大量勞動者因網路獲得了就業機會，零工經濟(gig economy)釋放出了閑置資產與勞動力。有研究指出這對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更有裨益，因為她們獲得線上職業的能力較普通女性更強(莊家熾、劉愛玉、孫超，2016)。還有研究指出女性的性別特質更適合互聯網的線上工作(毛宇飛、曾湘泉，2017)。

網路技術支撐跨地域即時溝通成為可能，當面對面的線上服務形式開始普及，勞動形式的轉變體現為彈性的工作時間(flexible work time)和在家自由辦公(home office)的大量湧現。對新技術帶來的工作方式變化，帕特里夏·華萊士(Patricia Wallace)以組織傳播視角，重點考察了網路推動的工作場所的變革與工作節奏變化，關注員工工作與休閒之間的模糊界限、彼此溝通方式的轉變和企業組織模式的差異(帕

特里夏·華萊士，2010)。勞動過程和空間變化研究均認同，線上線下不僅是空間改變，也是工作方式的徹底變化。除了關注了線上工作對組織、家庭的變化與影響，女性主義延續了政治經濟學關注空間、階級與權力的視角，開拓了父權制度對女性日常與家庭勞作的壓迫這條研究路徑（烏蘇拉·胡斯，2011）。

隨著新經濟發展，新網絡平台和新勞動方式應運而生，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們開始檢視網絡平台中內嵌的權力結構，進而探究平台經濟中資本、技術和勞動三者之間的互構關係。新近一項對 UI 設計師的調查表明，知識勞工的常態化加班機制，是互聯網產業的金融化、知識技術的迭代化和工作彈性化的結果，體現為資本的隱蔽勞動控制與勞工的有限自主性的「互構」（侯慧、何雪松，2020）。另一項研究以亞馬遜土耳其機人為分析對象，探究其運作機制和內嵌其中的勞動控制問題（姚建華，2020）。從這些研究成果來看，網路平台勞動者的能動性和結構性制約，互相控制互相抗衡，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組力量關係。

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既涉及女性的在線勞作，又關聯到在線勞動者與平台的勞資關係，還牽涉到背後若隱若現的技術迷思和數字資本的影響，因而我們將延續以上研究思路與成果，並在新職業特質和新勞動環境中展開對問題的思考。

## 研究方法

自2018年4月開始，通過為孩子挑選授課教師的契機，我進入了田野，結識了某在線一對一公司的三位女性授課教師，與她們溝通良好，獲得了她們的信任。通過介紹，以滾雪球方式認識了15位一對一網課女性全職教師，有幾位因為擔心被公司知道而不願意接受訪談，最終得到有效採訪者總數為14人。自2018年5月至12月間，我對她們進行了兩次，每次一小時的半結構化訪談。老師們散居國內各地，訪談採用微信視頻或語音電話進行，結束後以資料採集費名義發送與課時相當的微信紅包作為補償。所有的訪談錄音通過科大訊飛在線軟件轉錄並進行分析。有的老師後期曾多次補充回答了我的追問。我們還找到了三位同屬於該公司的兼職教師，形成了與全職教師比對的次群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組(subgroup)。培訓行業類資訊通過諮詢在美國上市的、市場上知名的另一家培訓機構作為補充。研究資料還包含了近一年的線上田野觀察，包括上課情況監看、觀察教師微信朋友圈的動態和對百度貼吧、知乎、求職網路等社區發布的經驗貼與求助貼的關注。

在線訪談開始時我以家長身份進入田野，帶來的好處是與其他家長、學生、班主任交流的便利，我們對報課的學生與家長亦陸續有簡短採訪。教師訪談主要圍繞日常工作，售課、備課、上課等話題展開，包括如何看待在線職業及其未來前景。儘管在訪談之初我便表明研究目的，再三保證資訊不會洩露，但教師們對個體所在地理位置和真實學歷總是有些迴避，她們更願意談論遇到的學生和家庭情況，在線授課的「奇遇」和在线職業的感悟。同時，被訪者的身份差異影響訪談態度，對學術有所了解的兩位女教師顯示出對本研究計劃的極大興趣，而所認識的班主任作為田野中的把關人(gatekeeper)，則不時向我打聽研究進行的情況，顯得頗為警惕。女教師們的謹慎起初被我們解讀為普通人對訪談可能會有的抵觸心理，是對個人隱私和利益的自我保護，當訪談快結束時我才突然「頓悟」，將這種掩飾與互聯網平台的宣傳話語，在線教育的技術邏輯、技術迷思與社會結構勾連起來，並嘗試通過意識形態建構和技術平台結構層面進行整體闡釋。當訪談結束時，通過採取寄送小禮物或主流課堂的考試資料為「伎倆」，我們獲得了各位受訪者真實的居住地址，這同時也是她們的在線勞作之處。訪談不僅要盡可能收集個體資訊，還需對資訊細加分辨，研究過程中我對此謹記於心。

## 研究發現

### 女性教師的家庭線上勞作

線上一對一女教師的構成具有顯著共性，通過對訪談教師進行人口變量收集，我們發現這些青年女性在人生經歷、教育背景、年齡組成和空間位置均較為相似。她們全部出生於1992–1996年間，大多數人生活經歷都很簡單：自小生活在中小城鎮，有兩人在直轄市重慶(非主

城區)，只有教師F在重慶讀完大學，其他女教師都曾離家到其他城市求學，本科畢業後重新回到父母身邊。這些女性全職教師大多擁有二本學歷，屬於當前社會學家們討論的「小鎮青年」，她們畢業時間不長，正處在向職業過渡 (career transition) 的「學徒」階段，這份線上授課工作對不少人而言堪稱「職業初體驗」。<sup>2</sup>

一對一課程面試機會並不難獲得，且效率頗高，只需要在微信公眾號或網頁填完基本資料，遞交申請便可加HR的微信。HR核實學歷情況後會安排線上面試和第二輪面試，通過便可參加線上培訓，這一階段主要過濾掉工作態度有問題，鬆懈懶惰或者性格偏激的人。作為中小城鎮的90後出生組，女教師們恰逢其時，獲得了一種與線上技術緊密交織的生活機遇 (life chance)。根據受訪者以往生活軌跡敘述，網課全職女教師們多處於大學畢業這一個人事件 (personal event) 完成後，有幾位曾經做過其他工作，時間均不長。大多數人是因同學或朋友介紹加入網課教師行列，因此受訪者彼此有人際關係 (主要是大學、初中高中同學或閨蜜) 的嵌套，少部分人通過戶外廣告或線上網頁獲知招聘資訊。詢問她們當網課教師的初衷，答案意外的實在：「那時候有點窮」(受訪者B，2018年7月4日)；「報名時候並沒有想很多」(受訪者D，2018年6月3日)；「應該會學到一些東西吧？」(受訪者M，2018年10月18日)；「聽說做得好月收入過萬，我的同學XXX介紹我來的，她幹得挺好，能拿錢」(受訪者E，2018年9月17日)。畢業後面臨的經濟壓力和個體獨立願望成為求職的主要原因，求職的迫切和面臨新工作的迷茫構成她們彼時心理。

對這些中小城鎮青年而言，散居在中小城市而非物價高昂的大城市，與父母或家人共同居住，降低了個體生活成本。互聯網平台公司實行鼓勵推薦政策，宣傳的「月薪過萬」的迷思顯現出較大的誘惑。初中科學女老師K工作積極勵志，她給我看過5、6月的工資短信，顯示月收入扣除五險一金後仍然有7,000、8,000元。已經是4級講師的她不時介紹新人加入以獲取每人600元的「內推」獎勵。該平台生源較多，課費收入和彈性工作時間令她感到滿意，她說：「……寒暑假(收入)會更多，勤奮的老師月薪上萬沒什麼問題。……(公司)名氣大的好處是學生多嘛，課時容易飽和，另外一家(線上平台)就沒有這裡課費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高，而且聽說會拖工資什麼的」(受訪者K，2018年7月9日)。K老師描述的在線工作輕鬆拿高薪，畫面美好得有些「失真」。其他被訪者對薪酬和工作的滿意度描述與她大不相同。我們了解到，高工資並非是互聯網所謂的溢價效應，而是與線上教師需要承擔的高課時有關。培訓行業每年寒假暑假總共三個月是教師最忙碌的時間段。課時排滿連軸轉，此時確實有少數教師收入近萬，但其他月份課很難達到這種收入水準。隨著培訓行業競爭加劇，雖然對家長的售課單價每年都在上漲，但一對一專職教師的課金並沒有提升，家長的高額課費，老師們根據級別只能拿到其中45-80元左右，每個月完成50課時的基本工作量才能獲得底薪外的課費，這部分錢同樣根據教師級別發放。如果個人課時無法達到最低要求，主動離職就成為多數人的選擇。為此，網課教師在入職初期的2到3個月內呈現高度流動態勢。

2018年訪談進行初期，接受訪談的老師們對培訓行業還充滿信心。影子教育市場的熱潮催生大量補習教師的高薪神話，大學生畢業後做培訓機構教師不再被認為是大材小用。進入培訓行業之前，教師身份、高薪誘惑、培訓業的繁榮、互聯網平台的宣傳，均令年輕人對線上影子教育的未來充滿期盼。與她們熱情地向我們宣揚公司前景形成反差的是，公司向家長傳遞的教師資歷則經過了有意刪剪，線上勞動女性的真實身份與狀態被隱匿，或是經歷了一番刻意包裝。例如，家長很少知道女教師們確切的地理位置和畢業學校。除了隱藏勞動者經驗和教育背景等訊息，公司突出和誇大師資，強調教師們通過五重考核篩選，宣稱擁有「培、磨、研、學、聯、監六維聯動的線上教學全鏈協同機制」，「教師培訓、磨課實踐、教研開發、日常教學、高效溝通和品控監督六大環節」(摘自公司宣傳語)。宣傳話語通過強化教師選拔過程的精細和標準嚴苛，試圖打消家長們報課的疑慮。

儘管地理位置被刻意隱匿，但教師們的勞動空間並不會憑空消失。這種虛擬的「空中課堂」建立在教師與孩子兩個家庭空間的基礎上，依靠連線互動交流與溝通。視頻連通後兩個空間瞬時都發生了性質轉變，尤其是教師家庭空間轉化為知識勞動的場所，原本私人空間「度讓」給半公開的領域。教學螢幕上展現出環境迥異的兩個物質空間，教師自身的家庭空間和學生家庭空間。線上觀察課程會有許多有趣的發現，一旦視頻連通，原本「後台」(backstage)的居住空間轉向「前

台」(front region)，環境顯示出經濟狀況、家庭品位、城鄉差距的細微差別，顯現出一定的城鄉與階層差異。此外，家庭中家居(domesticity)陳設會因不同的媒體介質而發生改變，作為移動性(mobilization)客戶終端的手機和平板電腦在居家環境中替代了以往位置固定的電腦，尤其是無限網路代替以往固定網線之後，移動收看成為常態。對學生而言，原本玩樂休息的環境變成了課堂，加上遠程教學幹擾因素多，視頻另一端的老師們想要控制學生整堂課的注意力並不容易。

以往研究指出女性在線工作的性別優勢在本研究中得到了支持，溫柔和藹的女教師與主流學校以管束為主的教學方式完全不同，一對一的平等交流很容易吸引授課對象。但我們發現這種女性的情感勞動(affective labour)並非天性使然而是刻意培訓的結果。兒童雖然不是購課者，可是他們是否喜歡老師會成為家長報課的考量因素。因為關係到能否獲得訂單，沒有實踐教學經驗的新手老師必須學會與兒童積極溝通，這成為公司培訓時強調的內容。

線上工作可以與遙遠的學生連接，實現距離的消失(distant disappearing)，不限時間地點移動辦公和居家工作對僱主和僱員都更節省成本，也被普遍視為有優勢的新工作方式，然而工作體驗後，教師們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線上授課將生活分裂為線上世界和真實世界兩部分，長期在線工作產生的問題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在家打開電腦即工作，個人生活與工作邊界日趨模糊。二是線上教學並沒有建立真實的工作環境，公司文化或企業氛圍缺失。互聯網技術縮小了原本龐大的組織，該公司的上海總部集中了管理和銷售人員，散居在家的教師們則普遍缺乏歸屬感。三是網課教師們彼此缺少社會交往，工作無法提供有效人脈積累，偶爾的線下活動很難發展出真實的社會關係。

## 技術使用與勞動者的困境

作為數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女教師們伴隨互聯網快速發展一同成長，能迅速掌握線上課程的授課形式。該機構網課學習平台有平板電腦(PAD)、手機和筆記本多個客戶端供下載。低齡段學生們更習慣使用PAD登錄，因為PAD作為遊戲和娛樂工具為他們所熟悉；網課女教師們通常用個人手提電腦工作。上課前教師需要在平台導入課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件，課後所上內容有語音回放。線上工作的技術迷思很快被卡頓、掉線或無法登陸等打破，除了平台不穩定，公司的手寫板也不好。2018年的課費漲價後，公司進行了技術平台的擴容改造，但卡頓問題並未完全解決，只是增添了課程結束後推送的教學內容和教師評語。我們了解到，國內其他一對多網課教育平台可以實現課程全程錄影，供觀看回放，互動答題、遊戲答題、課程預習、動畫講解、機器對播等多種訓練方式和激發手段。相比之下，這家主打一對一視頻輔導的公司技術只夠滿足日常教學，遠談不上令人滿意。

儘管技術在教學中不盡如人意，平台技術卻充分發展為對勞動過程的監控。邊沁(Jeremy Bentham)提出象徵權力的「圓形監獄」(panopticon)被福柯(Michel Foucault)進一步闡釋，並描述為當代社會的全景敞視主義(the complete visibility in panopticism)，作為權力與知識結合的新監視機制，它像毛細血管狀、遍佈於機體，令人難以逃避(福柯，2012)。線上學習雖然是一對一課程，但平台控制無處不在，像是一種新型的數字圓形監獄(digital panopticon)，在互聯網社會表現為全景性敞視的線上格子間。公司的技術完善主要用於平台對勞動過程的掌控，無所不在的監控成為監視勞工、獲取財富的手段。為了保證線上工作者待命的狀態，公司不時有周會和臨時排課，不及時回覆公司、運維、家長和學生可能面臨投訴。無時不在的監視和呼叫成為在線教師每日必須應對的工作內容。

崗位設置是對技術監視的另一種有效補充。班主任平時通過監看課程內容，了解上課情況。開課後班主任老師會將任課教師與家長拉成一個微信群，進行平台許諾的一對一專屬定制服務。班主任責任是提供家長和老師的課程協調，每兩周與學生家長電話溝通一次，主要是催促耗課和保證續課，潛在的職責是防止逃單或是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實踐中其漏洞也頗為明顯。老師N告訴我們有家長找她，想要孩子和她通過微信視頻私下上課，但家長的「雙贏」建議很少被接受，原因是老師們擔心違背公司利益的行為一旦被發現，可能會遭到解僱，因為他們所簽的格式化合同主要條款均有利於僱傭者。資料收集過程中，我們不時在知乎、各類求職網和律師求助平台觀察到多起該公司員工離職時的薪資糾紛，糾紛原因多種多樣：有五險一金未按照

要求繳納、入職離職和工作時間計算差異、或認為個人行為觸犯了公司利益而被解僱。我們嘗試與幾位發帖者聯繫，沒有得到回覆，推測應是發帖者因精力財力不足以應付冗長的法律程序，導致鬥爭行動僅僅停留在線諮詢或發帖抱怨上。在線勞動者雖然有維護自我權益的意識，但除了原本交際圈，他們普遍缺乏與新同事的聯繫，更沒有傳統工廠或辦公室勞動的工會組織作為後援，也就無法有計劃有組織地向平台爭取權益。

正如影子教育專家所指出的，影子教育的核心始終是學生在主流教育中的學業表現。家長續課的主要原因是孩子在學校課業競爭的排名中上升。報課沒有明確訴求的家長屬於極少數，大部分家長（即使家境優渥）對子女成績的態度均帶有顯著的功利色彩，注重學習成績和排名的提升。一旦發現網課沒有效果，就會更換輔導機構。老師們告訴我，不管多難搞定的家長，只要孩子成績提升，態度立刻大轉變，不停地感謝老師，續課不在話下。為此，強調成績提升的考核成為公司近年的風向。但是，平台為學生和女教師們提供視頻連結，卻無法保證遠程教學的課堂效果，授課質量的問題被拋給毫無實戰經驗，剛剛接觸影子教育的青年女性。培訓業教師的教學能力需要時間提升，絕非一朝一夕之功。對當前中小學主流教育內容並不了解的女性教師，被要求輔導在校生的課業，在日常教學中經常感到孤立無援。老師們認為，公司缺少真正的課堂實踐，培訓的重心也完全不在教學，上課遇到的問題全靠教師自己摸索。老師們的壓力體現在以下對話中：

我主要是給初中上課，當時報的就是這個，聽說公司缺高中老師，高中課費也比我們貴，但能上的，嗯，不太多吧，很難招到好老師。畢竟都是剛畢業的年輕人應聘……家長花200元課費要的是200元效果，而不是50元效果。但如果我花很多時間備課，課時量根本完不成。還有轉化學生的壓力，排了測評課得上，會得開啊，說是錢多事少離家近，感覺事情一點兒也不少。（受訪者L，2018年11月21日）

那種月薪過萬的傳說聽聽就算了，得很拼才行。有的人上140節課，基本工資4,000、5,000的話，課時費拿到6,000多，這才能上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萬，平均下來每天得上20節課，週六周日不休息。班主任她們總讓我多上點，就是勞動力麼……我是準備繼續考編的，每個月5,000、6,000還能做點自己的事情。上課那麼多備課的時間呢？那(備課)總得有個標準吧，至少在(我)心裡差不多才行。(受訪者H，2018年11月13日)

我們訪談的14名全職女性教師有9人教授小學、中學階段的英語、語文，內容多為英語語法的初步講授，或小學語文字詞句段篇章的講述，缺乏名牌高校的兼職教師擁有的理科解題分析能力。該公司規定講授中小學奧數或高中課程老師會有附加課時，而她們只能按最基礎課時計算收入。公司缺乏主流課堂的實踐教學經驗，規律性的集體備課和教研討論幾乎沒有，而且大規模的線上勞工進行面授培訓幾乎不可能，事實上，互聯網平台保證教學品質比傳統學校困難得多。幾位期望在培訓事業有所發展老師對此感到失望。作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她們有一定的學習能力，但公司提供的「乾貨」太少。而在工作量上，為了達到底薪要求的課時，她們必須努力將學生報課意願轉化為現實的訂單，並爭取每週更多的課時配置，以防止個體和家庭跌入收入「不穩定」(precarious)的狀態，是否有訂單、課程內容和總量如何保證，都讓她們感受到精神壓力，對自我勞動的價值評價相比訪談之初有明顯落差。

在一對一在線培訓案例中，新的勞動形式和計酬方式與平台的盈利模式密切相關。我們發現，新模式受益於近年互聯網公司流行的「去實體化」(disembodying)和「分包」(subcontracting)帶來的靈感。「分包」將企業所面對的、需要完成的任務向自願參與的個人進行分工，為企業獲取利潤產生了更隱蔽的新剝削形式，用更多的勞動者參與、更少的勞動資料投入，更少的企業責任去獲得更多產出。「去實體化」省去了傳統培訓公司房租、水電、工作人員等大筆資金投入；「分包」依靠網課教師的勞動時間售賣獲利；試聽課的「轉化」將獲取課源的責任轉移至老師們肩頭；「空間度讓」更讓女教師們犧牲家庭隱私空間，將其轉變為勞動場所並完成勞動；女性勞動還包含了情感投入、情感控制等在線工作的「情感勞動」。

我們進行訪談的半年時間內，女教師們從入職初的興奮轉為對平台的失望。2019年下半年影子教育競爭日趨激烈，線上網課效果開始遭到部分家長質疑，網路上不時有離職教師和家長爆料，導致平台售課壓力繼續增加，教師們對工作穩定和未來前景感到憂慮。截止2019年12月底，我們訪談的全職教師中有8位離開了這家公司，還有6人仍在授課。我們追蹤詢問了幾位老師在職或離職的感受，曾對收入感到滿意的H老師也開始抱怨公司待遇在下降；C老師上課常因緊張身體不適，兼課主要是減輕家庭的經濟壓力，但覺得自己並不適合這份工作。J老師發現自己是廉價的上課機器，入職時運維和HR都不尊重老師，培訓課教授的「話術」也令人生厭。重慶的F老師乾脆辭了職，她獲得了一份HR工作，儘管工資差不多，但能與很多人打交道，感覺能力和素質都有提升。她的朋友G老師也更換了線下工作，她認為公司描畫的講師上升通道沒有什麼吸引力，現在工作薪水固定且沒有售課和上課壓力。技術為這些女性提供了新的工作機會，但工作本質卻是無技能勞動者必須完成的分包任務。某種意義上說，全職教師的離職意味著捨棄互聯網平台的去奴役化 (disenthrallment) 道路，回歸傳統線下勞動不失為另一種穩定的選擇。

### 駁雜的「技術迷思」及其矛盾

傳播技術革新總是突出體現為對時空某種形式的突破，網路技術促發「地理的消亡」(geography disappearing)，即時通訊讓一對一視頻輔導在技術上成為可能。尤其是地理的終結一度成為網路技術迷思的重要成分，「地理終結的迷思始於這樣一種觀點：電腦傳播使得空間可以無限延展，這是對將人們從空間限制及其狹隘的經濟與社會內涵中解放出來的過程的邏輯延伸」(莫斯科，2010：86，87)。這種迷思對勞動者意味著無需移動，不用通勤，打開電腦便可開始居家工作。勞動者被吸引而來，訪談初期間及對公司印象，女教師們回答與該公司廣告宣傳詞幾乎毫無二致，認為一對一課業輔導讓孩子回家「打開電腦就能上課學習」，在線教育未來前景十分光明。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細加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在快速擴張市場的過程中，公司技術迷思混雜了日常生活中現成的迷思，並進行商業包裝。這包括一方面強調「一對一」的因材施教、量身定做，以滿足城市中產個人定制的偏好。另一方面一直強調「北大清華」為師資的宣傳(事實上是該公司的兼職教師來自國內985高校中的15所)。頂級名校光環加身，讓該在線培訓機構立刻獲得市場關注，吸引家長前來諮詢。受訪的全職老師多為普通院校的二本、三本學歷，她們不滿公司混淆全職教師與兼職教師，以北清高材生身份模糊她們身份，誤導家長的做法。我們在上海市場監管局網站看到，2019年11月2日該公司因違反廣告法第九條被上海市虹口區市場監管局行政處罰，其違規行為包括大量與事實不符的廣告宣傳內容。2020年我們查閱資料時，發現該公司發布的宣傳內容仍未徹底刪除。

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對互聯網為了降低成本的「眾包」(crowdsourcing)、「零工經濟」、人機競爭與合作等新勞動形式進行了全面描述，並指出新興的勞動形式面對的困境打破了下一代互聯網工作的美好幻想(莫斯科，2018)。技術平台通過將勞動者遠距離、低成本調度，幫助勞動力得以跨越自然地理界限，這些網路世界中游牧(nomadic)的女性被線上教育作為勞動力徵用，平台盈利建立在女性勞工創造的訂單和服務之上。表面上，線上技術提供了一份月薪報酬的職業，而非計件的外賣類「零工」，但究其本質，仍然屬於需要個人爭取訂單的計件工作。<sup>3</sup>公司廣告和介紹工作時宣傳的「合理的工作量」「月收入過萬」「時間自由」只是一種迷思，努力爭取訂單，讓學生完成「課時消耗」，才能保證女教師們的基本收入。

莫斯科通過互聯網世界的觀察揭示了資訊技術的政治經濟邏輯，他認為資訊技術的推進與轉型往往是為了迎合數字資本滲透與盈利的需求(莫斯科，2018)。本研究對此亦有所觀察。地理的終結或空間的消滅給數字資本帶來了極大機遇，為線上教育的技術迷思宮殿奠定了重要基石。對平台而言，勞動力聚集和任務分包均建立在互聯網世界的資訊發布和資源調動基礎上，可以快速滿足市場需求。在該公司大規模推廣之前，培訓機構「學大教育」為代表的線下的一對一模式因勞動力和場地成本過高，缺乏後續投資而失利。該公司整體構想是學大



教育的低成本線上版，因與「互聯網+」結合而獲得資本追捧。<sup>4</sup>數字資本關注漂亮的財務報表和快速盈利的可能，「迷思」不僅激發人們對新開發市場的想像，更點燃投資人的熱情。這家公司熱衷於構建技術迷思，目的並非吸引單一消費者購課，更想要吸引數字資本的持續投入，因為這決定著互聯網企業在瞬息萬變市場中的生死。

從意識形態層面理解「技術迷思」，必須扣連當前政治經濟結構中的互聯網迷思如何被利用，以及數字平台行動與效果的落差這兩條邏輯線索。線上教育迷思並非無本之木，其藤蔓始終附著於互聯網迷思的根莖之上。線上教育剛出現時被視為線下教育最有力的替代者，代表未來的趨勢。國家對互聯網參與教育的期許是讓邊緣地區人群接觸到優質教育資源，減少知溝差異，促進社會階層流動，通過互聯網技術拉平東部與西部，城市和農村的教育差距。為此，在教育部的推動下，相關政策大量出台，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至今共發布超過10份與線上教育有關的政策，整體而言，政策態度以鼓勵發展為主，規範行業為輔。<sup>5</sup>政策優待被解讀為政治力量扶持的合理想像，對比傳統線下培訓面臨的各種整頓、競賽與「坑班」被取締、政策不斷變化的風險市場，線上教育確實因為「互聯網+」所代表的技術加持，籠罩在相對寬鬆的氛圍中。正如該公司廣告與自我包裝所體現的話語，線上教育公司利用了國家對互聯網教育的迷思，將自身努力裝扮為有社會責任感的互聯網企業，以獲取政治經濟的發展空間。

然而，教育資源分佈不均勻、教育結構不統一的歷史與現實若依靠某種簡單技術就能迎刃而解，這難免令人心生懷疑。<sup>6</sup>公司運營中技術迷思存在著邏輯漏洞，與Coursera、edX、慕課(MOOC)等開放教育平台推行的「大學去圍牆」，教育資源線「開放共用」的精神相違背的是，這裡只有支付才能擁有服務。幫助無法享受到優質教育的偏遠城鎮兒童獲得學業發展，就像永遠無法兌現的商業期票。針對地域發展差異問題，公司曾經在宣傳內容顯示新疆某高分考生因受到清華老師輔導，圓了清華夢。而我們了解到國內偏遠地區(新疆、雲南、西藏、甘肅等地)人們很少聽說該一對一線上教育。面對經濟與階層差異，公司曾推行貧困家庭分期付款購課，推行幾個月後該活動便被取消。雖然有較低收入家庭為提升子女學業沖動購課，但長期購買課時包的消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費者多來自沿海發達地區，家境優渥的中產家庭。這些目標客戶的私人補習消費(在質量保證前提下)會帶來其子女學業的提升，從而更加拉開教育差距，而非縮小它。

即使地域與階層差異被抹平，網路平台能否提供有價值的培訓服務仍值得懷疑，公司本質更像提供勞動力整合和資訊傳輸的互聯網公司，而非教育培訓機構，公司對教學品質的控制超出了平台的管理能力。全職教師們每日在不同年級、不同地域教材之間輾轉，還需要為個人生存不斷開拓新生源，一對一高品質的教育理念只能成為家長一方的迷思。同時，經濟發達地區的優質教育產品存在著區隔，體現為各地教育機構對優質師資的壟斷、教育政策的把握和重要考試命題的權力，這些主流學校的教研團隊幾乎不會與線上平台進行商業化合作。儘管公司不時發布與北大清華合作的新聞，或是舉辦教師技能大賽，其本質均為總公司策劃的媒體宣傳活動，與大多數普通全職教師(包括我的所有受訪者)沒有任何關聯。缺乏教育質量的保證，通過購買課時消費，普通家庭期望獲得的「教育公平化」迷思最終只能淪為一句空洞的口號。

## 討論與結論

2018年我們考察之初，一對一在線輔導平台還是較新的互聯網經濟模式，但在線教育市場競爭激烈、變幻莫測，這讓我們在資料收集與訪談階段有一種緊迫感，擔憂不能跟上在線培訓業的變化。論文完成時間超出了預期計劃，雖是因行動拖遝導致進程緩慢，但幸運的是，在一年半的時間內，我們陸續觀察到整個行業面臨的數次機遇與衝擊，也因而獲得了較長時間段內審視在線影子教育的機會，並通過追蹤受訪者獲取訊息，補充了勞動者在變動中的選擇與行動資訊。本研究的主要局限在於訪談者與平台聲稱的龐大的在線勞工數目相比，樣本量較小，通過調研戰線拉長和追蹤訪問，研究得到了更多觀察與資料的支撐，這多少彌補了研究廣度上的缺憾。

線上影子教育的快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技術迷思曾被廣泛接受，儘管與其他互聯網技術神話一樣，其迷思褪色也頗為迅速，從



2017年到2020年，市場、家長和教師們的熱情都在快速消逝。在公司迅速發展壯大時期，一對一網課線上輔導並未完全普及，人們對在線教育效果有所期待。正如莫斯科所言：「當技術變得稀鬆平常的時候——真正地（例如，電力）或者象徵性地成為尋常之物，它們的社會影響力卻達到了頂峰」（莫斯科，2010：17）。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迫使主流教育也開始投入線上教學，「全民網課」讓線上學習的神秘感，學習者的新鮮感快速消失，報課家長對線上學習的優劣勢也有了明確感受，社會對在線教育的技術迷思被更冷靜的效果評價所替代，在線培訓正面臨著技術「祛魅」（disenchantment）。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以往忽視在線教育的優質教輔機構的被迫線上化，會對我們討論的這類在師資和內容方面存在短板的互聯網一對一培訓平台形成更大的衝擊。

這項研究是一次嘗試，我們試圖將商業意識形態與微觀的在線勞動場景結合，撥開互聯網企業利用「技術迷思」的面紗，將作為主角的勞動者和作為資方的技術培訓平台，作為配角的政府和數字資本同時納入視野，打破了以往數字勞工研究或局限於在線勞動過程和感受，或局限於技術與勞動形式探討的壁壘，並試圖將新媒介環境下平台技術、數字資本與勞動價值的批判相關聯，展現女性在線教師對平台技術的審視和個體勞動價值的重估過程。此間目的並非針對該公司勞動模式和商業宣傳手段，並將這種話語歸結為一種經營者占領市場時無可避免的行動策略或無傷大雅的商業謊言，而是通過分析技術迷思的駁雜成分，理解其在資本市場和國家權力背景下製造「虛假意識」的意圖與功效。

在線勞工的迷思褪色與迷思「祛魅」有關聯，卻並非同一步調，後者通常發生在技術普及後，而前者可能發生在接觸技術平台和真實勞動過程的任何時刻。在我們討論的勞動情境中，國家力量和數字資本積極參與各種新經濟模式，網絡平台製造迷思以吸引剩餘勞動力和資本關注，而勞動者的真實生活和訴求很少被傾聽。從天而降的線上工作並不像該公司宣傳廣告那般輕鬆，它意味著多重壓力、情感勞動和隱形付出，女性勞工的在線工作很難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而高質量的輔導技能無法通過標準化培訓快速教授，個體被迫面對學生、家長、學業成績和公司業績的多方壓力。技術平台所宣揚的迷思為新經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濟貢獻了一個迷人肥皂泡，新迷思產生了短暫的集體幻覺，打造了一個有前景的市場需求。人類歷史上的技術革新與長久的迷思總是相伴而來，而缺乏真正的技術革新，製造迷思就成為互聯網公司爭取消費者關注、數字融資和生存空間的必要手段。還必須指出的是，影子教育在線工作的一切都並不新鮮，它牽涉到國內技術創新不足而勞動力充足的社會歷史背景。若真正的技術變革尚未到來，商業新模式還將以技術迷思自我粉飾，類似的線上勞動故事在未來仍會不斷上演。

## 註釋

- 1 需要指出的是，當前描繪線上謀生的勞動者的概念較多，包括數字勞工 (digital labour)、線上工人 (online worker)、線上勞工 (online labour) 等，研究側重不同。線上勞工強調線上的工作形式，工作內容並非局限於數字產業，相關研究多集中於勞工組織、薪酬計算和勞動價值分析，適合我們所討論的全職網課教師的勞動情境。文中對網路平台背後的資本力量仍沿用相關研究常用的數字資本 (digital capital) 概念。
- 2 雖然沒有獲得公司全職教師男女性別組成數據，但我們在田野中發現女性所占比例確實非常高，調查後可以提供兩種初步的解釋：一是男性在親和力和表達方面不佔優勢，工作獲得和完成情況不如女性。二是線上工作很難滿足男性對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的需求。與此同時，女教師人員組成一直在發生變化。從該公司的班主任和運維處我們了解到，與正在以線上工作同時準備考研和考編的大學生相比，公司現在更願意招收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女性，因為後者的流動性小且工作投入度更高。跟蹤調查中我們還發現，青年女性與線上勞作的家庭婦女邊界並非涇渭分明，隨著她們快速步入婚姻殿堂，這些青年女性與前文提及的受過大學教育，提供線上勞動的小城鎮家庭女性形象可能會逐步重疊。
- 3 隨著平台競爭激烈，原本在2017、2018年較容易獲得的工作錄取率也在不斷降低。該公司最近開始大量招收新教師培訓，每期600-800人，每週好幾期培訓班，這些培訓人員主要被安排上薪資計算為0.35小時的測評課。這類課程授課時間短、含金量低，成為開挖新生源的手段。互聯網公司以臨時工代替正式工的策略節省大量用人成本。此外，未被錄取者前期投入的培訓時間、沒有滿足的課時量、為輔導課程準備的腦圖或課件都為網課平台佔有，這部分勞動亦是普遍被忽視的無償付出。

- 4 2014年，該公司獲得青松基金天使輪融資；2015年7月，獲得順為資本近2000萬元A輪融資；2016年3月，完成由達晨創投、順為資本提供的B輪融資；同年9月，獲得華興新經濟基金的數億元C輪投資；2017年7月，獲得明星資本Star VC的C+輪投資；2017年底，獲得由華平投資和元生資本提供的1.2億美元D輪融資；2018年完成3.5億美金E-1輪融資，由CMC資本、中金甲子、中投海外直接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聯合投資，多家機構跟投。線上影子教育行業中，該公司的融資成績最為亮眼。
- 5 2019年7月12日教育部等六部門聯合發布的《關於規範校外線上培訓的實施意見》標誌著線上教育的監管終於落地，行業進入規劃運行時代。政府除了一如既往地加強日常監管，規範校外培訓市場秩序。同時推進「互聯網+教育」，鼓勵符合條件的主體發展線上教育。它對網課教師的影響體現在教師資質的要求，當前正在授課的教師和新進入行業者都要求在2020年取得教師資格證。但這種行業要求似乎只是多了考證的形式，對公司運營影響不大，我們所在的網課QQ群裡時常見到幫助新手老師快速獲證的培訓廣告刷屏。
- 6 2018年12月13日，一篇名為《這塊螢幕可能改變命運》的深度報導在公眾號發布後閱讀量迅速升至400多萬，點讚量30000+。《冰點週刊》的報導講述了248所貧困地區學生通過網路與西南名校成都七中同步學習，命運軌跡因直播而改變的動人故事。評論區裡網課者的經歷、教育人士的情懷、民眾的稱讚，混合著感動的淚水讓這篇8350字的報導成為不斷延伸的演繹文本。報導印證了互聯網初期對線上教育的美好想像，令技術樂觀主義者歡欣鼓舞。不久後，網上爆出該文章多處提及的某網課運營商是其背後推手，優質報導被證明是商業軟文，此事或可成為技術迷思被數字資本利用進行宣傳的典型。（原文參見程盟超（2018）。〈這塊螢幕可能改變命運〉。《中國青年報》微信公眾號《冰點週刊》12月13日推送特稿，引用時間2019年4月21日。）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丁小浩、翁秋怡 (2015)。〈權力資本與家庭的教育支出模式〉。《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第3期，頁130-142。
- Ding Xiaohao, Weng Qiuyi (2015). Quanli ziben yu jiating de jiaoyu zhichu moshi. *Beijing daxue jiaoyu pinglun*, 3, 130-14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 中投顧問(2018年8月)。*〈2020–2024年中國K12教育行業深度調研及投資前景預測報告〉*。上網日期：2019年8月25日，取自<http://www.ocn.com.cn/reports/2298kjiaoyu.shtml>。
- Zhongtuo guwen. (2018 August). 2020–2024 nian zhongguo K12 jiaoyu hangye shendu diaoyan ji touzi qianjing yuce baogao. Retrieved August 25, 2019, from <http://www.ocn.com.cn/reports/2298kjiaoyu.shtml>.
- 中澤涉(2015)。*〈日本的影子教育：聚焦高中階段的課外補習支出〉*。《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第3期，頁17–28。
- Zhongze She (2015). Riben de yingzi jiaoyu: Jujiao gaozhong jieduan de kawai buxi zhichu. *Beijing daxue jiaoyu pinglun*, 3, 17–28.
- 毛宇飛、曾湘泉(2017)。*〈互聯網使用是否促進了女性就業——基於CGSS數據的經驗分析〉*。《經濟學動態》，第6期，頁21–31。
- Mao Yufei, Zeng Xiangquan (2017). Hulianwang shiyong shifou cujin le nüxing jiuye-jiyu CGSS shuju de jingyan fenxi. *Jingjixue dongtai*, 6, 21–31.
- 文森特·莫斯科(2010)。*〈數位化崇拜：迷思、權力與賽博空間〉*(黃典林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Mosco, V.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Wensente Mosike (2010). *Shuwei hua chongbai: Misi, quanli yu saibo kongjian* (Huang Dianlin, Tran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osco, V.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文森特·莫斯科(2018)。*〈數字勞工與下一代互聯網〉*(徐恩驢、張岩松譯)。*《全球傳媒學刊》*，第4期，頁127–139。
- Wensente Mosike (2018). Shuzi laogong yu xiayidai hulianwang (Xu Caisu, Zhang Yansong Trans.). *Quanqiu chuanmei xuekan*, 4, 127–139.
- 卡爾·馬克思、弗裡德裡希·恩格斯(196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原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
- Kaer Makesi, Fulideli Engesi (1961). *Makesi Engesi quanji* (Zhonggong zhongyang Makesi Engesi Liening Shi Dalin zhuzuo bianyi ju, Trans.).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akesi Engesi quanji ewen di er ban*)
- 史蒂芬·R·英里奇(2017)。*〈日本「影子教育」決策：學生的選擇還是家長的壓力？〉*(余藍譯)。*《教育科學研究》*，第5期，頁67–76。
- Shidifen R. Yingliqi (2017). Riben “yingzi jiaoyu” juece: Xuesheng de xuanze haishi jiazhang de yali. (Yu Lan, Trans.). *Jiaoyu kexue yanjiu*, 5, 67–76.

- 米歇爾·福柯(2012)。《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三聯書店。(原書Foucault, M. [1991].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Sheridan, A., Trans.]. London: Penguin.)
- Mixieer Fuke (2012). *Guixun yu chengfa: Jianyu de dansheng* (Liu Beicheng, Yang Yuanying, Trans.).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Foucault, M. [1991].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Sheridan, A., Trans.]. London: Penguin.)
-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2007)。《神話學》(周昌忠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Levi-Strauss, C. [1978]. *Mythologiques I-IV*. Paris: Plon.)
- Keluode Liewei-Sitelaosi (2007). *Shenhuaxue* (Zhou Changzhong, Trans.).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Levi-Strauss, C. [1978]. *Mythologiques I-IV*. Paris: Plon.)
- 李佳麗、何瑞珠(2019)。〈家庭教育時間投入、經濟投入和青少年發展：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影子教育闡釋〉。《中國青年研究》，第8期，頁97-105。
- Li Jiali, He Ruizhu (2019). Jiating jiaoyu shijian touru, jingji touru he qingshaonian fazhan: Shehui ziben, wenhua ziben he yingzi jiaoyu chanshi. *Zhongguo qingnian yanjiu*, 8, 97-105.
- 林曉珊(2018)。〈「購買希望」：城鎮家庭中的兒童教育消費〉。《社會學研究》，第4期，頁163-190。
- Lin Xiaoshan (2018). “Goumai xiwang”: Chengzhan jiating zhong de ertong jiaoyu xiaofei. *Shehuixue yanjiu*, 4, 163-190.
- 帕特里夏·華萊士(2010)。《工作場所中的互聯網——新技術如何改變工作》(王思睿、印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Wallace, P. [2004]. *The internet in the workplace: How new technology is transforming 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telxia Hualaiishi (2010). *Gongzuo changsuo zhong de hulianwang-xin jishu ruhe gaibian gongzuo* (Wang Sirui, Yintong, Trans.).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Original book: Wallace, P. [2004]. *The internet in the workplace: How new technology is transforming 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邱林川(2014)。〈告別 i 奴：富士康、數字資本主義與網路勞工抵抗〉。《社會》，第4期，頁119-137。
- Qiu Linchuan (2014). Gaobie i nu: Fushikang, shuzi ziben zhuyi yu wanglu laogong dikang. *Shehui*, 4, 119-137.
- 尚培勝(2017)。《校外的「重點學校」和「實驗班」——南京市某影子教育機構的社會再生產機制研究》。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Shang Peisheng (2017). *Xiaowai de “zhongdian xuexiao” he “shiyian ban”—nanjing shi mou yingzi jiaoyu jigou de shehui zai shengchan jizhi yanjiu*. Nanjing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胡詠梅、範文鳳、丁維莉(2017)。「影子教育」會擴大教育結果不均等嗎?——基於PISA2012數據的中國、日本、韓國比較研究》。《教育經濟評論》，第5期，頁43-71。

Hu Yongmei, Fan Wenfeng, Ding Weili (2017). “Yingzi jiaoyu” hui kuoda jiaoyu jieguo bu jundeng ma?—Jiyu PISA2012 shuju de zhongguo, riben, hanguo bijiao yanjiu. *Jiaoyu jingji pinglun*, 5, 43-71.

馬克·貝磊(2000)。「補習性私人家教：規模多大，意義如何?」。《比較教育研究》，第1期，頁61-62。

Make Beilei (2000). Buxi xing siren jiajiao: Guimo duoda, yiyi ruhe? *Bijiao jiaoyu yanjiu*, 1, 61-62.

馬克·貝磊(2007)。《教育補習與私人教育成本》(楊慧娟等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中文版書根據以下報告合併而成：Bray, M. [1999]. *The shadow education system*. UNESCO, France; Bray, M. [2003]. *Adverse effect of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UNESCO, France.)

Make Beilei (2007). *Jiaoyu buxi yu siren jiaoyu chengben* (Yang Huijuan, Trans.). Beijing: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Zhongwenban shu genju yixia baogao hebing er cheng: Bray, M. [1999]. *The shadow education system*. UNESCO, France; Bray, M. [2003]. *Adverse effect of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UNESCO, France.)

馬克·貝磊(2012)。「影子教育」之全球擴張：教育公平、品質、發展中的利弊談》(廖青譯)。《比較教育研究》，第2期，頁15-19。

Make Beilei (2012). “Yingzi jiaoyu” zhi quanqiu kuozhang: Jiaoyu gongping, pinzhi, fazhan zhong de libi tan. (Liao Qing, Trans.) *Bijiao jiaoyu yanjiu*, 2, 15-19.

馬克·貝磊、劉鈞燕(2015)。「課外補習研究：問題與方法」。《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第3期，頁2-16。

Make Beilei, Liu Junyan (2015). Kewai buxi yanjiu: Wenti yu fangfa. *Beijing daxue jiaoyu pinglun*, 3, 2-16.

烏蘇拉·胡斯(2011)。「高科技無產階級的形成：真實世界裡的虛擬工作」(任海龍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書Huws, U. [2003].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Wusula Husi (2011). *Gaokeji wuchan jieji de xingcheng: Zhenshi shijie li de xuni gongzuo* (Ren Hailong, Trans.).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Huws, U. [2003].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侯慧、何雪松 (2020)。〈「不加班不成活」：互聯網知識勞工的勞動體制〉。《探索與爭鳴》，第5期，頁115–123。
- Hou Hui, He Xuesong (2020). “Bu jiaiban bu chenghuo”: Hulianwang zhishi laogong de laodong tizhi. *Tansuo yu Zhengming*, 5, 115–123.
- 姚建華 (編) (2017a)。《製造和服務業中的數字勞工》。北京：商務印書館。
- Yao Jianhua (Ed.) (2017a). *Zhizao he fuwuye zhong de shuzi laogong*.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姚建華 (編) (2017b)。《媒介產業的數字勞工》。北京：商務印書館。
- Yao Jianhua (Ed.) (2017b). *Meijie chanye de shuzi laogong*.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姚建華、徐婧 (2017)。〈數字時代傳播政治經濟的新現象與新理論〉。《全球傳媒學刊》，第3期，頁30–43。
- Yao Jianhua, Xu Jing (2017). Shuzi shidai chuanbo zhengzhi jingji de xin xianxiang yu xin lilun. *Quanqiu chuanmei xuekan*, 3, 30–43.
- 姚建華、徐偲驢 (2019)。〈全球數字勞工研究與中國語境：批判性的述評〉。《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5期，頁141–149。
- Yao Jianhua, Xu Caisu (2019). Quanqiu shuzi laogong yanjiu yu zhongguo yujing: Pipanxing de shuping. *Hunan shifan daxue shehui kexue xuebao*, 5, 141–149.
- 姚建華 (2020)。〈在線眾包平台的運作機制和勞動控制研究——以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為例〉。《新聞大學》，第7期，頁17–32。
- Yao Jianhua (2020). Zaixian zhongbao pingtai de yunzuo jizhi he laodong kongzhi yanjiu-yi yamaxun tuerqi jiqiren weili. *Xinwen daxue*, 7, 17–32.
- 夏冰青 (2018)。〈中國媒介產業中實習生的困境研究：以S和X兩家大型互聯網公司為例〉。《全球傳媒學刊》，第4期，頁116–126。
- Xia Bingqing (2018). Zhongguo meijie chanye zhong shixisheng de kunjing yanjiu: Yi S he X liangjia daxing hulianwang gongsi weili. *Quanqiu chuanmei xuekan*, 4, 116–126.
- 莊家熾、劉愛玉、孫超 (2016)。〈網路空間性別不平等的再生產：互聯網工資溢價效應的性別差異，以第三期婦女地位調查為例〉。《社會》，第5期，頁88–10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 Zhuang Jiachi, Liu Aiyu, Sun Chao (2016). Wanglu kongjian xingbie bu pingdeng de zaishengchan: Hulianwang gongzi yijia xiaoying de xingbie chayi, yi di san qi funü diwei diaocha weili. *Shehui*, 5, 88–106.
- 徐林楓、張恒宇(2019)。〈「人氣遊戲」：網絡主播行業的薪資制度與勞動控制〉。《社會》，第4期，頁61–83。
- Xu Linfeng, Zhang Hengyu (2019). “Renqi youxi”: Wanglu zhubo hangye de xinzi zhidu yu laodong kongzhi. *Shehui*, 4, 61–83.
- 徐家慶、周遠翔(2018)。〈異質性層面、影子教育與教育公平〉。《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頁154–160。
- Xu Jiaqing, Zhou Yuanxiang (2018). Yizhixing cengmian, yingzi jiaoyu yu jiaoyu gongping. *Nantong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5, 154–160.
- 高雪蓮(2017)。〈區隔的童年：城市兒童與鄉村流動兒童的課餘世界〉。《北京社會科學》，第9期，頁24–33。
- Gao Xuelian (2017). Quge de tongnian: Chengshi ertong yu xiangcun liudong ertong de keyu shijie. *Beijing shehui kexue*, 9, 24–33.
- 唐俊超(2015)。〈輪在起跑線——再議中國社會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社會學研究》，第3期，頁123–145。
- Tang Junchao (2015). Shuzai qipao xian—Zaiyi zhongguo shehui de jiaoyu bu pingdeng (1978–2008). *Shehuixue yanjiu*, 3, 123–145.
- 孫萍(2018)。〈知識勞工、身份認同與傳播實踐：理解中國IT程式員〉。《全球傳媒學刊》，第4期，頁97–115。
- Sun Ping (2018). Zhishi laogong, shenfen renting yu chuanbo shijian: Lijie zhongguo IT chengshiyuan. *Quanqiu chuanmei xuekan*, 4, 97–115.
- 孫聰、金文旺、蔣承(2018)。〈關於我國影子教育二元結構問題的研究〉。《中州學刊》，第9期，頁83–85。
- Sun Cong, Jin Wenwang, Jiang Cheng (2018). Guanyu woguo yingzi jiaoyu eryuan jiegou wenti de yanjiu. *Zhongzhou xuekan*, 9, 83–85.
- 曹晉、許秀雲(2014)。〈傳播新科技與都市知識勞工的新貧問題研究〉。《新聞大學》，第2期，頁93–105。
- Cao Jin, Xu Xiuyun (2014). Chuanbo xin keji yu dushi zhishi laogong de xinpin wenti yanjiu. *Xinwen daxue*, 2, 93–105.
- 曹晉、張楠華(2015)。〈新媒體、知識勞工與彈性的興趣勞動——以字幕工作組為例〉。曹晉、格雷姆·默多克(編)，《新媒體、社會性別、市場經濟與都市交往實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Cao Jin, Zhang Nanhua(2015). Xinmeiti, zhishi laogong yu tanxing de xingqu laodong-yi zimu gongzuo zu weili. In Cao Jin, Geleimu Moduoke (Eds.), *Xinmeiti, shehui xingbie, shichang jingji yu dushi jiaowang shijian*.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 張玉璞 (2019)。〈流動中的社會關係：上海外賣騎手移動媒體使用與社會資本〉。《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7期，頁167-198。
- Zhang Yupu (2019). Liudong zhong de shehui guanxi: Shanghai waimai qishou yidong meiti shiyong yu shehui ziben.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47, 167-198.
- 陳濤、鞏閱瑄、李丁 (2019)。〈中國家庭文化價值觀與影子教育選擇——基於霍夫斯泰德文化維度的分析視角〉。《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第3期，頁164-186。
- Chen Tao, Gong Yuexuan, Li Ding (2019). Zhongguo jiating wenhua jiazhi guan yu yingzi jiaoyu xuanze-jiyu huofusitaide wenhua weifu de fenxi shijiao. *Beijing daxue jiaoyu pinglun*, 3, 164-186.
- 劉保中 (2018)。〈「鴻溝」與「鄙視鏈」：家庭教育投入的階層差異——基於北上廣特大城市的實證分析〉。《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頁8-16。
- Liu Baozhong (2018). "Honggou" yu "bishilian": Jiating jiaoyu touru de jiecheng chayi-jiyu bei shang guang teda chengshi de shizheng fenxi. *Beijing gongye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ban)*, 2, 8-16.
- 薛海平 (2017)。〈家庭資本與教育獲得——影子教育的視角〉。《教育科學研究》，第2期，頁31-41。
- Xue Haiping (2017). Jiating ziben yu jiaoyu huode-yingzi jiaoyu de shijiao. *Jiaoyu kexue yanjiu*, 2, 31-41.

###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utor, D. H., & Dorn, D. (2009). *The growth of low skill service job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5150,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1434665>.
- Barthes, R. (1972). *Mythologies*.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 Bray, M. (2003). *Adverse effects of supplementary private tutoring: Dimensions, implications, and government responses*. Retrieved May 24, 2019,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8412747\\_Adverse\\_Effects\\_of\\_Supplementary\\_Private\\_Tutoring\\_Dimensions\\_Implications\\_and\\_Government\\_Responses](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8412747_Adverse_Effects_of_Supplementary_Private_Tutoring_Dimensions_Implications_and_Government_Responses).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6期(2021)

- Castells, M. (201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Chichester: Blackwell Publishing.
- Choi, Y., & Park, H. (2016). Shadow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South Korea: Examining effect heterogeneity of shadow education on middle school seniors's achievement test scores.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44*, 22–32.
- Fuchs, C. (2009).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69), 69–87.
- Fuchs, C. (2014).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 Krueger, A. B. (1993). How computers have changed the wage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microdata, 1984–1989.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1), 33–60.

## 本文引用格式

陳靜(2021)。  
〈褪色的技術迷思：影子教育的數字資本與女性在線勞工〉。  
《傳播與社會學刊》，第56期，頁127–159。

## 附錄 訪談的一對一教師基本情況

編號	性別	年齡	入職時間	地點	職業性質	所教科目
A	女	25	2017.11	安徽阜陽	全職	小學語文1-3年級
B	女	22	2018.01	浙江義烏	全職	小學語文1-3年級
C	女	25	2017.12	湖南嶽陽	全職	小學語文1-3年級
D	女	25	2017.12	河南周口	全職	小學語文4-6年級
E	女	24	2018.02	江西景德鎮	全職	小學英語4-6年級
F	女	26	2017.10	重慶市郊	全職	小學數學4-6年級
G	女	27	2017.11	重慶市郊	全職	小學數學4-6年級
H	女	27	2017.01	湖北黃岡	全職	小學數學4-6年級
I	女	25	2017.05	福建長樂	全職	初中語文
J	女	25	2018.01	四川廣安	全職	初中語文
K	女	26	2017.02	河南新鄉	全職	初中科學
L	女	24	2017.12	山東臨沂	全職	初中數學
M	女	24	2018.02	河南許昌	全職	初中英語
N	女	26	2017.04	湖北黃石	全職	初中英語
O	女	24	2017.07	河南周口	本科畢業後兼職	高中英語
P	男	25	2017.05	浙江杭州	研究生兼職	高中數學
Q	男	26	2017.10	北京市	研究生兼職	高中數學